

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或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通过读书,可能用前辈们的灵与肉进行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的。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的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多数人来说,读文学书才是最好的首选。譬如,因为太注重实用了,对于鲁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他的研究与表述,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片面。在这一点上,我所读出来的鲁迅,并不是那个普遍认同,只会将文章当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鲁迅精神不能理解为只是某种阶层或者执政当局的天敌。

惟 有阅读文学才会让我们明白,高贵是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共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还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

很多年后,真到儿子上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去到高尔基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儿子后来告诉我,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呆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传授了一个秘诀给他们,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

文学如何向现实「说话」

□范玉刚

文学关注现实一直是中国文学包括当代文学的传统,但作家如何“言说”现实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下的文学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自说自话了,于是人们惊呼文学失落了!其实,就文学自身而言,文学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好看了,但人们也越来越感到文学脱离现实、越来越新闻媒体化、越来越快餐化,文学似乎回到自身的小圈子自得其乐了!仔细洞察中国文学的当代史,文学何曾走入中心?在那个激情的年代,文学只不过挟外在“权势”(或政治或经济)徜徉于社会的中心而已。现在文学从某种倚重的“势”下解脱出来回复自身,这对文学来说未必是坏事。因此,我们与其怀念文学的“辉煌”,不如说怀念那个激情的时代,不论那个时代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有撩拨社会神经的某个文学之外的东西在作祟。人们借重文学的也是某种“势”,在多元化的文化思潮下文学被去“势”,“祛魅化”了,人们反倒不适应了,总想寻回那种“势”。在此意义上讲,不是文学的失落,而是某种“势”的失落,是某个时代的失落。“失落”后的文学却有一样功能未变:那就是文学如何对现实“说话”?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与现实交流、对话,甚至要相互交融共同建构,在一种共生共在中推动社会的发展。

当前纷繁复杂的境遇中,文学如何与现实相交融?面对新兴阶层的崛起和新富阶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文学如何关注底层民众?仅有“人民文学”重新出发就够了吗?面对大众文化的喧嚣躁动和狂飙突进,哪里还是文学的“容身之所”?文学性的弥散和文学的碎片化如何映射现实?一个时期以来,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吸引了批评家的目光,像陈应松的《马岭的血案》等作品,触及了人们心底的那种痛,文学对现实的“说话”和批评家对文学的“热忱”,似乎重新燃起人们对文学的某种敬畏感。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的“五彩缤纷”中显露出素朴的底色,一种久违了的对现实的关注重新“攫住”了大众的目光。一些关注改革进程中深层利益的博弈问题、揭露官场内幕的官场小说、一些关注环保问题的生态文学、科幻文学、灾难文学频频出场,一批关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文学,关注文化“走出去”的文学,一些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形象的建构。这些都是文学在固守文学性的立场上向现实“说话”,但这些声音似乎很难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而回复到往昔的话语中心。

于是,一些作家、批评家反思文学的困境,在影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下,文学还有多少“说话”的空间?文学该如何“说话”?还有多少人在听?退守自身的文学是掉头而去做一个自娱自乐者?还是做一个“麦田守望者”,守护最后一抹绚烂的夕阳?抑或勇于承担社会职责做一个批判者?这确实是每一个把文学当回事的人不得不问的问题。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和理想天空飘扬的旗帜,它永远不会过时也不会逝去,它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维度。文学应该回到自身的立场向现实“说话”,而不能做依附外在之“势”的爬虫。惟此,在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中,文学才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原本就在那儿,它须以文学的方式向现实“说话”。阅读经典与经典阅读仍旧是文学存在的一种常态,文学作为“虚灵的真实”,它更应该倾向于一种价值关怀,倾心于主流民族精神的重构。文学应该在自己的界域内耕耘于精神的家园,并在对现实的“说话”中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发挥文学的精神塑造、人格培养、灵魂滋润的功能。物欲侵占了人的心灵,在科技冰释了人的灵魂,我们要对文学满怀热忱!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可能是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多媒体比纸本文学更有文化味,甚至某些视像更唯美,而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王蒙曾在《中国新文学史》第五辑的总序言中有一段感慨:沉迷于昨天的高潮的同道,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有好几个精英意识比较强的写作人同行好友,痛骂世人的庸俗市侩伪儒化,我们可以假定这样的批评与提醒是适时的与正确的,但是你却有时需要以平常心面对渐渐非高潮化的社会,非高潮化的文学,在这个连“散文”都稀缺的时代,大众更愿意接受感官视觉的刺激,文学遭遇强势艺术门类如网络多媒体、电视艺术的侵蚀,在此境遇下,一些文学变幻自身的色彩,开始与大众文化共舞。为了赢得眼球有依附于强势艺术的倾向。超女、快女一类的节目和网络流行语已经侵蚀到文学的肌理,在逐渐销蚀文学的精神气质,使文学像像演艺活动,固然青春洋溢、活力四射,但在向大众文化的“看齐”中愈加失去自身的文学性及其艺术标准。在数字化技术引领下生成的文学新形态,已把文学的高贵性抛诸九霄云外了。文学已经时不我待地加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盛典,并在产业化运作中寻找新的生长点,这似乎正成为当下文学向现实“说话”的主导方式。这样的文学可能在追逐市场利润中膨胀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在市场力量的集合中可能生成成为一种缝合性抑或同一性的力量,从理想的云端坠落到现实的滚滚红尘。这样的文学可能未必被批评家看重,但很可能受到市场的吹捧和认可,并生成一种新的文学空间,甚至很有可能为新的意识形态所“收编”。这样的文学似乎在与现实的相互切近中如鱼得水,在与网络、影视文化的互动中高奏凯歌。

对此不必讶异,但可以反思。在“触电”、“触网”中,文学的力量是变得强盛还是衰弱了?从文化创意产业看,这无疑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种非传统的文学“说话”方式很可能使文学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于是乎,人们一方面感叹文学的失落,一方面惊奇于文学的无处不在。其实,我们不必为此焦虑,多元化的文学现实才会百花齐放。虽然失落了“文学的时代”,但当下的时代更加宽容,也就意味着文学愈加自由,其中,某些文学向自身的回归就越有可能以文学方式向现实“说话”,它就会去思考“为什么人的问题”,它就越发可能批判现实的丑陋,而召唤与塑造人生的良善,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本版责编:周玉宇

文学需要高贵

□刘醒龙

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当着一个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不同步,姑且不从宏大事物去观察,仅仅是生活本身就己经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中真有什么输赢的话,赢者也好,输者也罢,是成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一切皆由起跑线上那一步所决定。在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决无产生瑰宝的可能。在一个不知何为羞耻的人心里,也决不可能孕育出传世佳作。

如同近代史上的一部佳作, 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也是由于她所拥有的高贵气质。财富的积累并非太难,难的是人在任何时候对文学艺术的信仰与恪守。按照现在人喜爱以地域来划分某类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从古典中明确区分出来的新文学,几乎可以说成是“上海文学”了。而在事实上,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则大大地得益于文学。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诗歌和电影戏剧,奠定了上海这座城市比许多东方城市更为高贵的身份与高雅的名声。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年代,作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着文学的丰富魅力,让许许多多未曾有机会一睹城市英姿的人,开启了人生的向往之旅。

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好小说的标志,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一个时期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摹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

所谓中坚,当然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否只是跟着某种概念

文学创作发生研究的回顾与期待

□赵俊贤

文学创作发生研究是从文学作品发生过程的描述入手,旨在阐明文学作品生产的内在机制。这种研究对作家有借鉴作用,对读者有所启迪,有利于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鉴赏。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写于1962年的论文《从〈烈火中永生〉到〈红岩〉》(《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较早地试用了这一研究模式。

文章指出:“《烈火中永生》和《红岩》不是袖珍本与扩充本的关系。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中,作者们致力的目标不同,前者是对经过挑选了的史实的忠实记述,又倾注了作者们的浓郁感情;后者对人物事件都经过一番艺术家的想象、提炼、概括的功夫,作者们企图达到的是另一个目的——完成一幅革命英雄们崇高的精神世界的图画。”

评论家在论述了两种版本的不同目标之后,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如何从回忆录向小说发展。他总结了小说作家们的主要工作:其一,形成深刻完整的艺术有机体系。其二,在人物典型化上展开了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其三,小说在回忆性基础上深化了思想内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的评论家从阅读、批评的反馈这一角度探讨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过程。在详细论述反馈与陈奂生系列创作的关系后,这样总结道:“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反馈在它的创作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它的经验里,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从反馈角度看,系列小说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新型文学样式。因为它不仅是根据已有一种象进行创造比较‘方便’,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反馈信息对作品思想、艺术各方面进行调节、深化,把创作推向新阶段……二、系列小说创作中的反馈告诉我们,文学是一个系统。作家不可忘记,作品发表并不标志着这部作品创作的结束,继续它的创作的,是读者。作家创作,要有意识地吸收从读者那里发回的反饋信息以攀登新的高峰,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程文超:《从反馈角度看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

李庆本的《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译介国外生态美学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出发点推动现实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而且从人类整体的生态诉求出发,积极整合中西重要的学术资源,不断地推进美学理论建设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生态美学是在中西思想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原创性话语特征的理论,中西美学在生态维度上的对话与融合是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自觉地关注西方生态研究,出现了不少介绍西方生态发展的著述。但是从当前生态资源引人的状况来看,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生态文学批评、生态哲学智慧以及对生态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观念等方面,而对于生态美学的译介无论从深度与广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由于我国的生态美学长期缺少国外理论资源的有力支持,在学科构建的诸多方面遭到了质疑,甚至对生态美学的理论自洽性提出了挑战。李庆本的这部译著通过20余篇西方重要的生态美学研究文献,向我们介绍并评价了西方学者在生态美学及相关研究领域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而且对于破解当前生态美学发展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通过介绍以生态审美为核心的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和话语系统,揭示出西方生态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确证了生态美学产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部文集中收录的许多西方学者的文章都触及到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从理论基础和观念上看,国外生态美学强调系统整体性世界观,主张“自然—社会—人”的协调统一。这是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反思的前提下提出的一种新观念,超越了主客二上对立的机械论世界观,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是许多生态美学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国外生态美学的研究视域从上世纪的原始田园风光式的自然美学逐渐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并且摒弃了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审美静观说,强调生态审美体验的参与性。这种新型的美学观念也不同于环境美学。在许多西方生态研究者看来,环境美学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美学则主张生态

潮流四处泛滥?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着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欲望,再将欲望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力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所以,在那部几乎被所有当代中国人阅读过的红色经典里,保尔·柯察金即便真的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用钢铁做成的人,也有理由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在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不发出拷问:人类的品行高贵,不应该再有受到世俗非礼的时代,更不能以暴力相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依这部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文学元素来分析,我们阅读到的主人公实在没有不爱冬妮娅的理由,就这样将人的生命牵强地塑造到钢铁的程度,实在是一场天大的悲剧!在现实中,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离婚潮发生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不久,从解放区来的干部,纷纷抛掉同一意识形态阵营里的黄脸婆妻子,转过身来投入到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女人怀抱。以中国国情来看,在这一点上,这部红色经典有主题先行的嫌疑。还可以说,这种文学的无良因素,间接导致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段让人闻之色变的无良行为时期。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说,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日常读书,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

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以著名的《刘三姐》为例,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从这一点上,我们的民间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那就是,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的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就休想独自占有。这种流氓无赖者心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还在层出不穷。

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包括阅读在内的中国问题在于,人人都希望一分努力马上要得到一分回报。欧洲一些地方,一百年前开工的艺术馆,到现在还在建设中,中国人还稀里糊涂地嘲笑他们。前几天,在台湾的国民党,输了高雄市长选举。党主席马英九遭到了辅天盖地的批评,绝大多数人指责他,在高雄拼选举,不肯使用下三滥的招数。我很为这样的指责悲哀。如果马英九最终听信了这样的建议,那会更加令我悲哀。为了获得一张横行天下的卑鄙通行证,宁肯身陷卑鄙的泥潭,这样的马英九将会在未来的选举中输得更惨。卑鄙者貌似肆无忌惮,其实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也是陈水扁等一些人,拼命想将马英九抹黑的真实心理。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卑劣的卑贱。供世人阅读的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总在自诩的李敖先生虽然会读书,却实在算不上是好的读书人。

为什么读经典

评论家对《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修改过程的研究较为细致与深入,但遗憾的是,他们未曾涉及初版的写作即发生过程。也许是一种补偿,研究杜鹏程的一部专著开辟专章对《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作了专门研究。全章长达两万余字。专著立论的依据是《保卫延安》的手稿及著者与杜鹏程的对话。

专著写道:“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家自觉或不知不觉地从生活中发现美、冶炼美,从而铸造艺术美的复杂微妙的劳动历程。研究作家从深入生活、萌发创作动念到定稿煞尾的全过程,对于认识作家的审美理想、作品的审美特征是重要的一环。作家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是追求严峻而热烈的崇高,他的创作活动忠实地描绘了他的审美理想的生长轨迹。鉴于目前掌握的资料状况,我们仅能剖析《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即艺术构思征途。”(《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专著首先论述《保卫延安》从生活到报告文学到长篇小说的大致过程,然后从几个方面展开剖析:主题思想的深化、人物的典型化、结构的完美与个性化、审美理想的局限性在创作上的反映。从而,《保卫延安》的发生过程得到了较为准确深入与完整的阐述。

上述论著对不同的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对创作过程的某些规律有所说明,有益于创作借鉴,也有助于文学心理学等理论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无论评论家是否意识到是展开发生学研究,都较为零散,不够系统、完整。这说明,在我国尚未形成文学创作发生学。其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研究者对发生学的研究认识与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客观上的原因,即原始资料不易占有。在我国,作家的手稿分散在个人的手中,有的也没有妥善保存,研究者要使用它们困难颇多。

在国外,情况有所不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发生学研究相当兴盛。苏联、俄罗斯学者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几部巨著分别撰写过发生学的专著。

我们期待文学创作发生学的多种多样的专著面世,也期待文学创作发生学的有深度、有分量的单篇文章的大量产出。我们要建立起中国的文学创作发生学。我们在开展文学创作发生实践研究的同时,也要适度开展文学创作发生学的理论建设。文学创作发生过程研究的实质是作家生产一部作品或所有作品时的形象思维过程。对形象思维诸元素及其相互作用,对形象思维发展的阶段,特别是灵感现象,如此等等,都有必要作出理性探讨。

生态美学的新译介

——评李庆本的《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吴承笃

整体主义。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变化、侵扰和非平衡作为积极的生态美学因素,与环境美学所认可的静态的、平衡的自然法则大相径庭。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美学在西方研究者那里已经从传统的学科中破茧而出,成为一种新的美学研究范式。李庆本总结指出,国外生态美学具有从自然到环境再到生态的逻辑相承性,是产生于当下时代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此外,西方学者近年来热议的关于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以及新兴的生态美学是如何影响景观变化的等话题,不仅影响到生态美学学科的建设,更是触及生态美学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其次,积极把握生态美学研究的发展动向,宏观概括西方生态美学的整体面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逐渐从分散的美学价值观念探讨上升为成熟的美学研究。许多学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生态现状以及现实需求对生态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探索,推动生态美学的研究走向独立与成熟。该书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反映当前国外生态美学特点与发展方向的重要文章,展现出生态美学的整体面貌。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生态美学研究不再抱守主客二分的静观美学观念,而是更加强调生态审美体验的参与性,关注生态美学观念在现实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操作。跨学科研究以及应用性研究一直是国外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不仅促成了生态美学的独立,而且通过学科间的互补推进了理论研究在实践领域的相互融合。对于生态美学在景观设计和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可视化管理理论以及生态与审美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等研究,都反映出生态美学的现实参与性。生态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与这种实践性特点相呼应。国外不少生态美学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如利用设计好

的照片与问卷广泛的收集人们对于特定景观的审美反映,并且通过信息采集与数据分析,对生态美学进行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与我国注重哲学分析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可以丰富我国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在当前的艺术活动中透射出更多的生态内涵,生态美学与艺术实践的联系成为普遍关注的课题。国外许多艺术家和理论家致力于探索生态审美观念对于不同门类艺术的意义,关注艺术在处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揭示出艺术在生态美学背景下的存在特点。

第三,通过揭示西方生态美学研究的东方视阙,推动中西美学的对话与交流。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生态美学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古代美学在世界美学视野中的地位,推动了美学研究的资源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有不少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天人合一”、“致中和”等传统的东方生态智慧,反思西方传统美学和艺术中的“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等漠视或损害自然生态的观点,以回应全人类共同面对对生态问题。在该书中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的对东方生态智慧表示关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中有学者对道教和某些佛教教义的宇宙论及其各自的审美实践中所蕴含的生态资源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东方艺术中的生态整体主义特点,认为东亚审美实践为深入领悟环境伦理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洞见。还有学者通过虚构的东西方之间的对话,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展示出最朴素的东西方生态智慧的汇通。这些国外生态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借鉴,促进了中外生态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交融,不仅反映出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普遍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